

評論 | 誰殺了「互聯網自由」？美國 TikTok 禁令與數字主權的勝利

必須肯定的是，過去二十年科技行業的飛速發展離不開對開放、民主和全球化的願景。



2024 3 13 Brownsville SpaceX
Cheney Orr/Reuters/

在近期美國對字節跳動旗下短視頻平台 TikTok 「非售即禁」風波中，現任國務卿魯比奧（Marco Rubio）曾發帖稱：「共產中國掌控 TikTok 的算法，是他們監視美國人並操縱美國輿論的入口。」吊詭的是，這種論述難免讓人聯想到中國政府封禁外國社交媒體時的辯解：自 2009 年起，北京將臉書、推特、谷歌等平台視作「境外勢力」對華「和平演變」的秘密武器，強調未經審查的互聯網對國家安全產生威脅。

美國政府曾一度批評中國政府網絡封鎖。2009 年，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（歐巴馬）訪問上海時說道：「在美國，互聯網的自由開放是不容置疑的優勢，我認為這應該得到鼓勵。」彼時奧巴馬意欲維護的全球開放互聯網，後來無論在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當政下，都曾或多或少展開封鎖。而隨著國會推動法案，以「國家安全」理由要求外國公司出售社交媒體平台，華府一度推崇的「互聯網自由」議程，如今似乎趨向完結。

推倒數字柏林牆

在「歷史終結論」的宏大敘事下，後冷戰時期的美國曾對「全球民主化」充滿了期許；隨着西方自由主義在意識形態鬥爭中的勝利，威權制度雖仍然遍布世界多數國家，它似乎也逐漸失去動能。然而，在世紀交替之後，這種對全球自由主義的樂觀態度經歷許多起伏：在「九·一一」恐襲後，小布殊（George W. Bush）政府期間發動了失敗的伊拉克戰爭；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，共產黨對其政治制度的信心只增不減。在政治學家討論「民主衰退」、「威權韌性」之際，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挑戰了「華盛頓共識」。無論是認定「經濟發展推動政治自由」的現代化理論，還是推崇「軍事干預捍衛自由世界」的新保守主義，似乎都無法將美國設想的「全球民主化」變成現實。



2024 3 4

Mohammed Salem/Reuters/

在 2008 年美國經濟衰退之後，消費互聯網行業的增長不僅推動了美國經濟復甦，也為「歷史終結」提供了新的契機。從 2009 年的伊朗的綠色革命到 2010 年在突尼斯爆發的茉莉花革命，當地反對派的政治動員都利用了互聯網技術，在博客與社交媒體平台上抗爭集權政府；學界與媒體巧妙地將阿拉伯之春中的一系列運動稱作是「臉書革命」或是「推特革命」。在全球化浪潮下，互聯網曾推倒現實世界中的柏林牆。

奧巴馬政府意識到，隨着社交網絡將世界變成「地球村」，硅谷開發的技術將成為全球公民社會的平台。時任國務卿希拉莉·克林頓（Hillary Clinton）在 2010 年提出美國政府有責任維護全球範圍內的互聯網自由。她引用小羅斯福（Franklin D. Roosevelt）在二戰期間的「四大自由」理論，提出言論表達、宗教、免於匱乏、免於恐懼之外，在信息社會中「連接自由」（freedom to connect）必須得到保障。她提出，任何政府都無權剝奪民衆的互聯網自由。而這種對互聯網公司推動「全球民主化」的想象，在當時被科技評論員莫羅佐夫（Evgeny Morozov）稱作為「谷歌主義」（Google Doctrine）。

「谷歌主義」促進了美國政府和硅谷私有資本的聯姻。哈佛法學院教授戈德史密斯（Jack Goldsmith）指出，美國本世紀初期的「互聯網自由」包括兩個原則。在一方面，其議程假定「市場、個人選擇和競爭」作為全球互聯網發展的指導原則，即以國家政府監管必須讓位於私有企業與全球化的非營利團體。另一方面，華府希望在互聯網上維護言論自由，並打擊中國、伊朗等國對境外網站的限制與封鎖；奧巴馬內閣長期譴責集權國家的「電幕」（electronic curtain，借鑑冷戰中的「鐵幕」）之際，該政府投資開發反網絡審查軟件，其任期內斥資超過一億美元。

與此同時，「谷歌主義」的擁護者一度認定集權政府對互聯網的審查是不可持續的。互聯網研究員祖克曼（Ethan Zuckerman）曾提出「可愛貓理論」：他強調集權政府若想限制互聯網，必須將政治動員信息和非政治內容（如貓貓迷因）同時封鎖，而封鎖後者將惹惱民衆。時任谷歌首席執行官施密特（Eric Schmidt）在 2012 年採訪中表示，中國的互聯網審查部署將導致該國無法「建設現代的知識社會」。在 2000 年中國入世之際，克林頓（Bill Clinton）總統宣稱北京的網絡封鎖無異於「試圖把果凍釘在牆上」。而希拉莉則認為，限制互聯網的國家將無法享受二十一世紀科技進步的紅利；沒有公開透明的信息和新聞報道，投資者也將失去對這些市場的長期信心。

互聯網審查的貓鼠遊戲裏，當時的美國政府、學界和業界已經認為自己下注了贏家。



2010 1 13

Jason Lee/Reuters/

「谷歌主義」及其不滿

此類樂觀的技術決定論將平台和網絡放在政治變化的中心，而忽視了複雜的區域現實和權力關係。莫羅佐夫在 2011 年出版的《網絡錯覺》（The Net Delusion）一書中批評賽博烏托邦主義，提出網絡技術既可以制約，亦可以加固傳統政治權力。抗爭人士通過社交媒體對抗專制政府的同時，當權者也可以通過互聯網技術打壓異議人士，甚至鞏固其現實世界中的政治權力。

從九十年代起，中國政府就對「互聯網自由」論述形成了最大的挑戰：中國在 1994 年接入互聯網，而「防火長城」的雛形在 1997 年已經出現。在 2009 年烏魯木齊「七·五」事件發生後，臉書、推特等社交媒體平台在中國被永久封鎖；谷歌搜索也隨即因審查糾紛退出中國市場。在中東民主運動的爆發之際，北京愈發意識到國際互聯網的政治動員能力。

對「互聯網自由」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。一方面，中共對「顏色革命」的恐懼，恰恰符合了 2000 年代末期美國政府和學界對「互聯網自由」的政治想象。例如，中國《國防報》在 2009 年 7 月的評論文章指出，摩爾多瓦的「推特革命」證明了美國社交網絡平台的「煽動力」，中國必須警惕互聯網成為「外部敵對勢力」對華「政治文化滲透」的新工具。但另一方面，幾乎壟斷全球互聯網服務的硅谷企業，亦有可能成為美國政府的長臂：2013 年斯諾登（Edward Snowden）向媒體泄露的美國國家安全局文件，揭露了「棱鏡」（PRISM）項目對全球計算機通信的監控。美國政府不僅僅長期對外國網絡系統滲透，還向國內科技企業直接索取外國用戶信息。

北京也在理論層面抨擊奧巴馬議程。2010 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《中國互聯網狀況白皮書》首次提出「互聯網主權」概念；2011 年，中國和俄羅斯向聯合國大會上交了《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》提議，強調「互聯網有關的公共政策問題的決策權是各國的主權」。2015 年第二屆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，習近平首次提出「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」。而 2017 年的《網絡空間國際合作戰略》則明確「反對任何國家借網絡干涉別國內政，主張各國有權利和責任維護本國網絡安全」。

與此同時，隨着硅谷企業的擴張，互聯網技術的消極一面逐漸展現，美國民衆對網絡平台的態度產生轉變。例如，2016 年總統大選中，曾經幫助奧巴馬當選總統、突尼斯民衆對抗強權的臉書，被視為傳播「虛假信息」、「仇恨言論」的罪魁禍首。在監視資本主義下，社交媒體對個人數據的採集與濫用，以及平台本身的成癮性，都成為了民主黨對硅谷公司問責、對平台內容監管的緣由，但某程度，其引起的爭議是，是否摒棄了反對政府干預網絡空間的原則。

但對 TikTok 的封禁彼時已經經歷了多個不了了之的版本：2020 年川普總統發布行政命令禁止微信和 TikTok；2023 年的 RESTRICT 法案則提出限制包括 TikTok 的「敵對國家」控制的技術。而 2024 年的法案之所以能夠快速通過，部分程度歸因於 2023 年 10 月巴以衝突再次爆發後，巴勒斯坦支持者在 TikTok 上反對以色列政府對加沙地區的種族清洗。在對外國網站「精神污染」國內民衆的假想擔憂中，中美鷹派達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識。今年 1 月，TikTok 下線之際，川普決定延期法案的實施，稱將尋找新的美國買家。



Oded Balilty/AP/

在中美科技「脫鉤」之際，科技全球主義正逐漸成為歷史。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對華為、中興的制裁，到拜登政府對中國半導體、量子技術、人工智能（AI）、電動汽車等產業的一系列「小院高牆」的禁令，美國無疑正加速邁向科技民族主義。

反觀整個過程，「互聯網自由」之夢中始終不乏雙重標準和自我矛盾。除斯諾登事件外，在奧巴馬政府宣揚網絡民主時，國內企業正向各國政府提供用於審查和監控的技術和設備；政府對網絡盜版判決重刑，致使 Reddit 聯合創始人亞倫·斯沃茨（Aaron Swartz）自縊而亡。而在商湯、海康威視等公司備受華府道德譴責的同時，包括 Palantir 在內的美國企業正參與以色列在加沙地區的人權災難。

強調「民主夥伴」的拜登政府，曾以「數字團結」（digital solidarity）回應歐洲「數字主權」所帶來的技術壁壘；時任國務卿布林肯（Antony Blinken）在 2024 年聲稱，美國政府願與「尊重權利」（rights-respecting）的夥伴合作，抗爭威權政府的科技戰略。這種回歸「普世價值」的嘗試，恐怕再次忽視了科技發展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現實。而在川普「美國第一」的現實主義政策下，這種對科技向善的理想也被擱置一旁。

在新的人工智能革命中，關於科技主權的爭論又在各國大語言模型（LLM）競爭之中再次喚起。隨着中國深度求索（DeepSeek）開放權重的 R1 模型發布對美國競爭對手的意外衝擊，美國衆議院已有議員提出在政府設備上禁止該應用程序；在韓國政府的要求下，各應用商店已經下架 DeepSeek 軟件。雖然包括楊立昆（Yann LeCun）在內的科學家視 R1 的創新為開源技術的勝利，同樣開發模型的美國 Anthropic 公司創始人阿莫迪（Dario Amodei）則建議美國政府加強對華出口管制，以遏制中國 AI 技術創新。

在本月法國與印度政府在巴黎合辦的「人工智能行動峰會」上，科技民族主義的較量也再次上演。美國副總統萬斯（J. D. Vance）稱川普政府不能接受歐盟對美國科技公司的管制，抨擊其對人工智能技術的過度監管，並呼籲歐洲政府不與威權國家在 AI 方面合作。而無論是法國總統馬克龍（Emmanuel Macron）宣布的法國本土 AI 產業投資計劃，還是印度總理莫迪（Narendra

Modi) 對保障全球南方國家享受技術創新紅利的要求，都體現了在中美科技軍備競賽之間，世界大多數國家對 AI 主權擁有渴望。

在 1996 年發表的《網絡獨立宣言》中，作家約翰·佩裏·巴洛（John Perry Barlow）代表網民喊話工業世界的政府：「作為未來的代言人，我代表未來要求過去的你們別管我們。在我們這裏，你們並不受歡迎。在我們聚集的地方，你們沒有主權。」在中美軍備競賽、全球科技監管的今天，巴洛對「賽博世界無主權」的宣言顯得過於天真。

但必須肯定的是，過去二十年科技行業的飛速發展離不開對開放、民主和全球化的願景。隨着各國技術的巴爾幹化，以「國家利益」為中心的科技發展必將面臨新的跨越國界的共同挑戰，甚至生存風險。而無論是相信「科學無國界」的開源技術社群，還是抗爭封閉系統的全球底層民衆，在超級大國與跨國企業的夾縫之中，或許還能找到新的能動性。